

15329

15329

目 录

| | |
|-----------------------|---------|
| 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 | 荣毅仁(1) |
| 党与政府教导、鼓励我前进 | 郭琳爽(17) |
| 一条心,一条路 | 孙照明(29) |
| 始终不渝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 简日林(42) |
| 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湯蒂因(49) |

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

荣毅仁

走出校门,开始做资本家

1937年,我刚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踏进了社会。我走出校门,没有遭受到其他大学毕业生那样的命运——毕业即失业的痛苦,很快就到我父亲创办的无锡茂新第二面粉厂去做助理,并且在实际上掌管了全厂的大权。从这一年起,我就开始当起资本家来了。当时,我觉得非常得意;所以有如此的心情,倒并不是因为自己当上了资本家,而是因为从此我可以实现我的理想。

我自幼受到父亲的教诲,他老人家看到国家不断地受到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弄得国穷民困,认为只有办实业,搞经济,才能救得了国家。我是深受这种影响的。我父亲看到许多富家子弟,一到社会上做事以后,往往就挥霍浪费,出风头,搞投机,以致堕落破产,因此时常勉励我们:“我家办的纱厂、面粉厂,都是老百姓的衣食事业,你们要爱护它们。”又说:“我们老一辈创业不知经过多少艰难困苦,不知费尽多少心血;你们将来一定要克勤克俭,认真做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就鄙视纨绔子弟,立志将来好好做一番事业,当时每逢暑假、寒假,就常到茂新二厂去实习。而当我从学校毕业、走进茂新厂正式做事的时候,

就格外热爱这个企业，每天一清早就到厂，晚上七、八点鐘才回家。特别是那时国难当头，更感到自己一定要按照着父亲的教誨，来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

我在茂新二厂做助理沒多久，“七七”蘆溝桥事变发生了，面粉因軍需关系，售价上漲。接着，“八·一三”上海抗战，面粉更为需要。当时我們厂里生产的面粉大都是供应軍隊需要，我更認為自己为国家做了好事，我在做爱国工作；而且厂里生产足，很賺錢，心中着实欢喜。但是，上海在打仗，敌人近在咫尺，又不免覺得緊張。不久，敌机濫炸无錫，申新厂堆棉花的一个仓库，首先中彈起火，內心更覺不安。以后形势更为緊張，我不得不考虑搬家的事了。不几天，我們全家就离开了无錫。临走时，还要求留厂的职工們維持这月厂，并說：局势一好轉，我就回来。其实，那时我对自己的前途如何也是茫然。

离开无錫后，我到了香港，在1938年春回到上海。当时我想：上海租界有英、美、法的勢力，在租界里居住，个人安全沒有問題。那时上海租界里也有我家办的几个厂，但这些厂早有專人負責，我无法插进去，有时只好到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去閑坐；人家都有事，独我是閑着。我看到有些人对各厂負責人应酬敷衍，对自己表示冷落，使我初次尝到了失业的滋味，感到非常苦悶。

我感到老閑着也不好，就設法同几个哥哥和亲戚合資开办小布厂，后来又添上些紗錠，搞个小型紗厂，又开了月鉄工厂。那时我們不願同日本人打交道，但为了保住这些企业，就想靠靠美国人，因此与一个美商接洽，把这些企业挂上美商牌子。受雇的两个美国人对我們拍胸：“美国人的财产，日本人

是不敢碰的。”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厂也赚钱。我满以为倚靠美国人的势力，可以维持这些企业，战争结束时，自己可以重回茂新厂工作。不料 1941 年 12 月 8 日，只听得几声炮响，日本人就进了租界。靠美国人是落了空了，企业因为挂了美商的招牌，第二天，日本人就派了监督官到厂。为了不使这些自己亲手创办的企业为敌人所掠夺，我只得违反自己的意愿，去同日本人打交道，申请发还企业。

在日本人控制租界以后，通货膨胀更是厉害，投机成风，物价飞涨，我这些企业资金短绌，周转困难，常向银行借款，仰人鼻息。企业的经营也极不稳定，有时赚钱很多，有时摇摇欲坠。我们认为只有自己办银行，才能扶植实业。于是在 1944 年，我们兄弟又开设银行，由我兼任经理。等我一当了银行经理，人家就“刮目相看”了，有的常来问寒暖，有的也来应酬敷衍，这与 1938 年我刚到上海时所受到的冷遇对比，真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感。

那时候，从我个人来说，虽不必有求于人，但是看到国家受人控制，精神上感到非常痛苦。上海有日军的岗位，我总是绕道而过，不愿受人格上的侮辱；我每次看到报上登载敌人打胜仗的消息，就深怨国民党不争气。同时，我觉得日本所以能侵略我国，又敢于同美国开战，无非是有强大的工业，因此更加强了我振兴实业的愿望。在这一时期，我天天盼着胜利早日到来，每天晚间就偷听短波，希望听到胜利的好消息。胜利终于盼到了，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晚上，我从短波中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真是兴奋非凡；全家男女老少也以为好日子终于到来了，从此中国可以由弱国一变而为强国，我们兴办

实业，也一定大有希望。因此，我就等待着国民党政府早日迁回南京，我可以立即收回茂新第二面粉厂，还可以恢复被日军烧毁的茂新一厂。

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的压榨下求生存

国民党政府回到南京时，我准备了一些资金，计划把厂收回来，早日开工。当时，我一方面去找我离开无锡时遗弃掉的职工，商量怎样开工生产；一方面又备了公文，向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管机关申请发还茂新厂，并且亲自前去要求早一点解决。虽然他们口头上一再答应发还企业不成问题，但是一连几个月过去了，还是音讯全无，使我着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人员也实在熬不住了，便暗示我送点钱去，公文立刻可以批下来。我万万想不到要求发还被敌人占去的企业，还要拿出“运动费”。但是，为了企业能早日复工生产，减少损失，我只得照送一笔钱。果然，随着我的钱进入贪官的腰包，“准予发还”的公文也就立刻批下来了。从此，我才开始了解国民党做官的勾当，心想我们办实业的人，应该一心一意搞生产，不必过问什么“政治”。

在交涉收回茂新二厂、复工生产的同时，我积极计划重建被日军烧毁的茂新一厂。有一家洋行听说我要买机器，便竭力向我兜销，非常迁就。可是在合同签订以后，原来“有现货”、“可以立刻装运”等等诺言都是一种招徕生意的骗局。经一再催促，直到1947年才运来一部分，第二年方才全部安装完毕。

为了收回茂新二厂，我花了不少的钱和精力。那时，我认为这些都不要紧，只要厂里开工就好了。我总算盼到了茂新

面粉出厂了。可是好景不常，开工不久，就遭到了“美援”面粉倾销的打击，我办好实业的愿望也第一次感到不太容易实现了。我在开始时还没有看清这一点。当时，善后救济总署运来大量面粉，只有少量小麦，我还天真地认为既是援助，而根据中国面粉厂设备有余、原料不足的情况，善后救济总署应该多运些小麦来让我们加工，维持我们面粉工业的生产。因此，我提出了“多运小麦，少运面粉”的建议。那里知道“美援”是假仁假义的东西，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倾销美国的剩余物资，结果，还是运来大量面粉，小麦很少运来，我的愿望落空了。

我们的纺织厂情况如何呢？抗战胜利以后，因为南洋各地需要很大数量的纱布，我国纱布出口南洋，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纱厂业务很好。但是这也只是“曇花一现”。这种厚利生意，很快就被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所垂涎，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纱布出口，各厂生产出来的纱布，只能卖给他们，由他们垄断出口，纱厂只能分得垄断利润的残羹。但是国民党政府还不甘心，还要棉纺织业买1,000万美元公债，我们申新一家就被摊派了100多万美元。这还不算，官僚资本还利用反动政权想出各种办法来挤垮我们。在发行伪金圆券的时候，蒋经国硬说我堂兄鸿元私套外汇，把他扣押起来，以此威胁棉纺织业按其规定的限价出售。后来按限价出售的棉纱，连棉花成本都不到；只有同官僚资本有勾结的人，才能买到便宜的限价棉纱，一般普通商人只能出黑市价格向他们转买。经过多次的榨取，我们纱厂胜利初期获得的利润，就被搜刮殆尽。

1947年，反动政府调整外汇，物价波动非常剧烈，朱子文

要我拋售面粉，穩定市場價格。當時，我認為穩定物價是一件好事，對國家、對人民都有益處，是愛國的行動，于是就聯合了幾家面粉廠一起拋售面粉，暫時也起了一些穩定物價的作用。我很得意，宋子文也很滿意，以後他還要我和國民黨糧食部一起，做面粉供應的事。但在反動政權和官僚資本統治下的舊中國，物價畢竟是無法穩定的。我這樣做，只是上了宋子文的圈套，在客觀上当了維持四大家族統治的傀儡。不久，宋子文下了台，國民黨監察院說我舞弊，對我提出了所謂“彈劾”，並向法院起訴。因此，監察院、法院、警察局、警備司令部等反動機關，都乘機向我敲詐勒索，直到上海解放前夕，還被敲去10,000美元。我真想不到過去自以為幫助國民黨政府穩定物價是愛國行動，反而因此受罪，作了國民黨內部派系之間爭權奪利的犧牲品。

由此，我深深地体会到，在這個貪污腐敗的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民族工業是絕對沒有前途的，實業救國只是一種夢想；單靠克勤克儉，企業也是不可能立于不敗之地的。可以說，我對國民黨反動政權已經深惡痛絕，希望它趕快垮台。1948年底淮海戰役之後，我更看出國民黨已經崩潰，為這個反動政權的壽命即將結束而高興。但是，我希望一個什麼樣的政府呢？說老實話，我自己也不很清楚，只想有一個賢明的、廉潔的政府就好了。我對共產黨也是疑懼的。當時聽到不少謠言，說共產黨實行共產、共妻，資本家要被清算、殺頭，不殺也要去做苦工。甚至还聽說：濟南成通紗廠資本家苗海南在濟南掃街。國民黨的這些反動宣傳，更增加了我的疑懼。那時，上海工商界當中有些人到香港去了。我家也有人主張走，

他們以為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一定要吃苦頭，不如帶些錢到香港，可以自由些；也有人主張不走，特別是我父親更為堅決，他認為自己長期受外國人的欺侮，辦實業就是想不受別人的欺侮，所以再也不願去仰人鼻息，同時，他又不願離開自己畢生精力所創辦的心愛的企業。他更說：“國民黨政府是歷史上最壞的政府，不可能再有比它壞的了。”我也不願做白華，又受到父親的影響，也就在猶豫中決定留下來了。

這樣一決定，心情倒開朗了。雖然我還沒有消除對共產黨的畏懼，但心想共產黨來就來吧，來了之後頂多把自己的企業交出來，反正在國民黨下面也是搞不好的。記得上海解放前不多時，有位友人還來同我商量到外埠辦廠的事，我還勸他：“去就去，共產黨來了也沒什麼要緊，只要把帳目搞清楚點。”也是在解放前一個月，我在上海的住宅落成，有人勸我不必搬進去了，理由是共產黨來了，還不是要搬走。我可沒有接受這番“美意”，還是搬進去了。可是搬進去沒有幾天，家門口來了几百個國民黨的軍隊，他們架起了機關槍，要我們搬出去。他們的目的無非是敲詐一番，我只得拿出几百銀元了事。那時我已經兼管申新紗廠的業務，每天就是在敲詐、吃官司、物價波動中弄得焦頭爛額，被壓得透不過氣來。

跟共產黨，從疑慮到靠攏

1949年5月24日夜，槍聲密集，聽說解放軍已經進入上海。第二天，我廠一位廠長坐了汽車來看我，說上海解放了。我當時很奇怪：為什麼解放了還能坐汽車？他告訴我：解放軍紀律很好，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由於好奇，就同他一起坐了

汽車出去看看，一路上看到的情形，果然如他所說。一回家，我把沿途所見，告訴我的愛人。大家对生命安是放下了心，但是对今后到底如何？企业怎么办下去？仍旧茫茫然，很是不安。

1949年6月3日，上海的党政負責人召集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談，我也接到座談会的通知，当时想：“去好呢，还是不去好？”考虑結果，認為“丑媳婦免不了要見公婆”，所以还是去了。在这个座談会上，党政首長宣布了“发展生产，繁荣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并要求大家繼續管理企业，安心經營。还說有問題可以提出来，有困难可以請政府帮助，勞資問題可以通过勞資双方协商解决。当时就覺得共产党能提出这一套办法，还不错，但对將來实际执行怎样，还有怀疑。我就抱着將信將疑的态度回到企业繼續經營。

說老實話，解放初期企业的困难确实是严重的，我的心情也因此而很不安定。那时，解放战争在繼續着，交通阻塞，原料供应困难，銷售都有問題；投机活动还没有扑灭，物价仍然混乱，币制也不稳定，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鎖禁运以及国民党飞机的濫施轟炸，要維持紗厂、面粉厂，确实是很困难的。这时，工人在生活上又提出了一些要求，更覺得非常吃力。我也耽心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不能办好經濟。当时，我只有把企业的实际困难向华东紡管局、貿易部、人民銀行等机关反映，請求帮助解决。并且，为了克服困难，我也主动提出了不少解决困难的办法，如供应原料、收購、定貨、加工、包銷、貸款等等。凡是我提出的办法，只要对生产有利，能够維持生产、渡过困难的，政府总是迅速的同意照办，从沒有受到过留难。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使我感到很快慰。更使我兴

查的是，在 1949 年底，人民政府就大力取締投机活动，并从而稳定了物价。这又是一个大“奇迹”。这使我不得不开始信服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了，感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办法，是实事求是的，說得到，做得到，同时感到自己过去 10 多年未能实现的办好实业的理想现在是可能实现了。从此，我开始認識了共产党，靠攏人民政府。于是，在推銷 1950 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債的时候，我代表荣氏各企业認購了 12 万份公債，表示我以 12 万分的热情来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1950 年 5 月，我以特邀代表的身份，代表上海工商界参加中央稅务會議和列席全国政协第二次會議。在政协开会时，有一件事是我終身难忘的。那是在开会前夜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会見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的心情一方面很高兴能見到国家的最高領袖，同时又在猜想着国家最高領袖一定非常严肃可畏，恐怕难得亲近。可是，当我見到毛主席的时候，他第一句話就开玩笑地說：“啊，荣先生，你是大資本家呀！”周总理也打趣地称我是“少壯派”。国家領導人員这种亲切和藹和无拘无束的态度，又增加了我对共产党的認識。在政协会議之前，我还参加了全国稅务會議。当我第一个发言的时候，当时財政部薄一波部長，听不懂我的口音，几次要我講的慢一点，以便把我的意見記下来，我一面感到有点难为情，一面又深深地为領導干部这种謙虛和認真的作风所感动。可是在这次會議上，对若干問題的爭执很多，上海的代表們也提了不少意見。当时有一个地区的稅务局長認為，国家如此照顧上海的私营工商业，上海工商界意見还这样多，真不應該。我听了很不舒服，立即插嘴說：“政府邀請我們来，原是要听我們的意

見。如果認為我們意見太多不好，那麼我們可以不提。”薄部長聽見了，就再三鼓勵我們要多發表意見，說人民政府的事是大家商量辦事的，批評了那位局長，對我的態度也提了意見。今天回想起來，當時能積極提出意見，固然是好的，但也應該說，那時提意見的出發點大半還是為了私營工商業的利益，沒有考慮到國家的利益。這兩次會議給我的教育是極為深刻的，它使我在思想上縮短了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距離。會後我覺得，以後光講做生意是不行了，還要多懂些道理。我回到上海，就和朋友們一起，選擇了“七一”黨的生日那一天，成立了學習組織，學習國家的政策和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想只有學懂一些政策和理論，才能好好地跟共產黨走。

在那個時候，對於共產黨，只是感到它在政治、軍事、經濟上都很有辦法，特別對它有好感的是它能幫助私營工商業克服困難，維持生產，從而以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辦實業大有可為。但是也有些問題，常常使自己不安寧，比如在公私關係上、勞資問題上，有些地方同自己想的有抵觸，因此往往引起爭執。當我看到私營工商業的蓬勃發展就很高興。那時，我認為是新民主主義，國營經濟固然要發展，它對國家和人民有好处，但覺得私營經濟也應該同國營經濟“平行發展，各得其所”，這樣也沒有什麼坏处。也就是，我思想上只是維護資本主義的利益，希望新民主主義“長存”、“萬歲”，而並不希望社會主義到來。

兩次嚴重的考驗

正當我們一心一意發展經濟的時候，突然抗美援朝運動

开始了。这个运动开始时，我确实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我恨帝国主义，特别恨美帝国主义，因为我曾经吃过它不少苦头，但对它也仍然有些幻想，觉得我们国家应当励精图治，大力进行经济建设，何必惹是生非，多耗军费，影响建设，何况美国将来对我国建设或许有所帮助。不多久，中国人民志愿军过了鸭绿江，捷报频传，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我才感到新中国如今确实是大不相同了，我们祖国确实站起来了。百年来常受外人欺侮压迫的民族，居然打败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这一伟大胜利，激发了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就在上海市工商界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的那一天，我热情地参加了游行，擎着大旗，迎着大风，从南京路外滩一直坚持到西藏路人民公园。这是我生平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以后我又积极投入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同全国人民一起，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神圣斗争。

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工商界出现了不少问题，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等等不法行为都发生了。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伟大的“五反”斗争。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这些不法行为确实不好，应该反掉。但是后来斗争到自己头上来了，心里很不痛快，以为自己这几年来一直靠攏党，做事也规规矩矩，没有犯什么错误，为什么也要“反”？又怀疑政策是不是在改变？记得我当时还对一位朋友说：“今天的政府很有办法，只要国家能够兴盛，我们个人牺牲一点也算不了什么。”这意思就是，如果

政府真的不要我們这批資本家，只要国家强，个人如何也就不去考虑了。斗争终究是苦痛的，我一面又要检查自己，一面又要安定各个企业负责人的情绪，精神上又紧张又苦闷。但经过“五反”运动之后，我倒很感谢这次运动了。因为，“五反”粉碎了我的“新民主主义万岁”的念头，使我认识到这种想法是极其危险的。在“五反”中揭发出来的许多具体事例，也使我认识到资本家的不良行为，如果不加以打击，任其滋长下去的话，势必会破坏国家建设，影响人民生活。因此，资本家只有老老实实地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对国家、对自己才有益处。

在消沉、苦闷中摸索道路

“五反”虽然反掉了我的旧的想法，但是新的思想却还没有树立起来，因此感觉到很苦闷，很消沉。经过“五反”运动之后，国家和人民还是把我们当做一家人，信任我们，在那一年夏天，我出席了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扩大会议，路过苏联时，还亲身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我以后还被选为全国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然而，我们资本家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出路究竟何在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萦回着。

在苦闷当中，为使这些问题求得解答，我想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中去找找看，因此在这一时期中，我就埋头自学。我看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主义基础”和毛主席的著作等等，阅读了这些经典著作，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我思想上的问题，但也启发了我对于立场、观点的一些认识，并且对我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

前途究竟如何？那还是在总路綫提出以后才明确的。1953年7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綫，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具体道路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接着，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又深入地讨论了私营工商业在过渡时期总路綫中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使我对本身的地位、前途和具体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認識。这在我真有说不出的开心。在政协常委会上，我发言說：“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更是‘人心所向’，这个‘人心’同样包括了我們工商界的心。”道路的明确給我以莫大的鼓舞，但回想起来，說得更深刻些，那时个人的思想感情还没有完全同社会主义結合起来，这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还没有完全剝开资本主义丑惡的一面来看一看，还没有去正視剝削的事实。

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5年8月，申新系統的企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各厂的全体职工和資方都以无比兴奋的热情来欢庆这件大喜事。政府派了公方代表与私方代表共同組成了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职工們热情更高，在不影响生产的原則下，組織力量，清点了企业的全部财产，清出了許多过去我們不清楚的财产，并公平合理地核定了私股股金。对原有私方实职人員，都根据各人的能力和資历，进行了适当的安排，我仍担任了公私合营申新棉紡織印染厂总管理处总經理的职务。企业合营后，无数的事实使我更加認識到社会主义經營管理的优越性。象

申新九厂在合营之后，棉紗的制造成本就比合营以前降低了15%；棉布的次品率也从20%降低到1%——2%左右。

1955年10月間，在全国工商联召开执委会會議的时候，毛主席还亲自主持座談会，恳切地向我們講了一、两个鐘头的話。毛主席要我們把眼光放远一点，認識社会发展規律，要我們不要怕共产，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指出我們的前途，說我們將來一定可以参加工人階級的队伍。这对我來說，又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听了毛主席的話，我回顧了荣家发家的历史，我的父亲和伯父，夢想办工业，救国图强，但帝国主义压迫我們，加上連年內战，我們的企业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父亲一輩曾經把希望寄托在北伐以后的国民党政府身上，可是蔣介石上台的第一着却是无端通緝我的伯父荣宗敬，敲詐了10万銀元。1934年，申新系統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我父亲以时值三、四千万元的財產抵押給中国銀行和上海銀行，簽訂了借款500万元的合同，不料只付了280万元，朱子文就暗示銀行停止繼續付款，存心想乘机挤垮申新系統企业，据为己有。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淞滬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分子还把我70岁的老父綁去40多天，勒索了几十万美元，还要給“破了案”的警备司令部送更多的酬劳。我自己从1937年以来經營企业也一直在风雨飄搖之中。我也回顧了解放前一般資本家的慘淡遭遇，同业間互相傾軋排挤，帝国主义的傾銷竞争，再加上資產階級的子弟吃喝玩乐，揮霍浪費，最后弄得傾家蕩产。“富不出三代”，几乎已成为資產階級家庭兴亡的規律，我們申新系統在上海的五个厂，就有四个是人家办不下去而卖給我們的。在过去，誰也掌握不了命运，真是一句扣人

心弦的話。今天又如何呢？我今天不僅在企业里有地位，有取
有权，生活有保障，還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了國家的政
权，受到了國家的重視和信任，真正可以好好地做一番事業。
我的子女，也得到國家的培養和教育，將來都有工作可做，在
新道德、新風氣影響下，只要他們好好替國家做事，他們的前
途用不着我耽心。聽到毛主席的話，我更認識到人是可以用
變的，過去是、現在是個資本家，不遠的將來，我一定能變成一
個勞動者。因此，我堅定地舍棄了“一人發財，眾人倒霉”的剝
削道路，真正把思想感情同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

毛主席的講話，在上海廣泛傳達之後，上海各行各業立即
掀起了大合營的高潮。在這高潮當中，我們全家也同整個上
海一樣歡騰起來了，連孩子們也卷進了這個熱潮。他們都盼
望早些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真是一股大勢所趨、人心所
向，不可抗拒的偉大的潮流！

1956年，共產黨和毛主席又一次指出我們前進的方向，為
我們安排好進一步改造的環境。中共“八大”文件中又對民族
資產階級作出確切的評價，提出了對今後改造的方針。在全國
工商聯會員代表大會開會之前，毛主席又邀集各地工商聯負
責人進行座談。毛主席肯定了我們一年來的進步，說：“我們之
間更熟悉了，更加靠攏了。”毛主席並且教導我們進一步發揚
愛國主義精神，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對我們是多麼大的
鼓舞。這句話的份量可不輕，更加強了我的自我改造的決心。

堅決向勞動者過渡

過去一向厭惡政治的我，在解放之後先後參加全國和上

海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工商聯以及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工作以來，深深地体会到中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平改造、贖買政策的偉大和正確。今天完全可以肯定，我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在於我如何把自己棉薄的力量貢獻給國家，為國家一天天更繁榮、更富強而努力。我20年前開始做資本家時候，決不會想到今天我會走上勞動者的道路。而事實上，今天我正同全國工商界一道，在自覺地、逐步地向勞動者過渡。

記得我在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曾經引過“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話，來表達自己要堅決改造成為一個勞動者的決心。我說：“‘共產黨宣言’曾講到：‘在階級鬥爭接近決戰的那些時期，統治階級內部，整個舊社會內部瓦解的過程便來得非常強烈，非常尖銳，致使統治階級中有一小部分人脫離出去而歸附於革命階級，即歸附於未來主人翁的階級。……現在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分子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而這便是已經進步到在理論上認識全部歷史運動進程的那一部分資產者思想家。’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雖然不是統治階級，但是人的本質可以改變的道理是完全一樣的。或許我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因此特別喜歡這一段話。這段話鼓勵了我接受改造的信心，當然也使我認識到改造的不易，要經過一番深刻艱苦的鬥爭的。”現在我正在按照這條道路走，我自己深信一定能夠改造過來，而在不久的將來投入光榮的工人階級的行列，做一個工人階級的真正的同志。

党与政府教导、鼓励我前进

郭琳爽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宰割，我们国家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的贫困落后的境地。我的上一辈在国外经商，和其他侨胞一样遭受到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因此，热望祖国能够强盛起来。当时曾满怀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心情归国创业。先后于1918年在上海开设永安公司，1921年创办了永安纱厂，幻想着对国家尽些力量，进行实业救国。可是成不成呢？干脆地说：这是不成的。因为旧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和压迫，要想实业救国，那是不可能的。在旧中国，我们永安系统的企业同许多民族工商业一样经历着悲惨的命运。如永安纱厂在1929年和1936年先后遭受到英国、日本棉纱倾销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影响，使我们面临崩溃的边缘。在抗日战争时期，永安纱厂又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蹂躏，机器、物料、纱锭受到严重的破坏。永安公司在过去曾向英美注册，希望得到保护，可是这是妄想，在上海淪陷时正因为永安公司挂了美商注册的招牌，反而遭到更大的损失；日本侵略者派駐了监督官来管理企业，把公司的全部現金劫走了。我们单从被侵略者掠夺去的棉花、棉纱、布匹、肥皂等等物资计算，估计损失达24万兩黄金之多。日本

侵略者还在永安公司屋頂花园花盆里故意放置炸彈突然爆炸，把我們周圍封鎖了 24 天，又強占企业在閘北區的全部房地產，这些損失是无法估計的。

抗战胜利后，又因受到美国剩余物資大量傾銷的影响，使我們新建的永安大楼原来准备開設國貨商場的計劃也无法實現。上海解放前夕，由于偽金圓券的貶值，我們的損失总值等于 4 万兩黃金，喪盡了我們的元氣。这都說明了处在旧社会里的民族工商业者，是透不过一口气的，在那时維持企业已非常困难，更休論实业救国了。

二

帝国主义者向半殖民地旧中国大量輸出商品，使永安公司不得不長期推銷舶來品，这样，也就助長了外国貨的傾銷。那时为了获取利潤，永安公司希望自己的企业象滾雪球一样地越滾越大，所以除經營環球百貨商場外，还兼营其他附屬事业：酒楼、茶室、咖啡室、旅館、戏院、彈子房、溜冰場、跳舞場和游乐場等，这些附屬事业大部分是为一些享乐至上的寄生階級服务的。

在同业竞争中大家相互不擇手段，甚至我的亲戚、同乡所開設在旧上海大馬路（即現在的南京东路）上的新新、先施、大新公司等，也都要在背地里派人暗中調查商品价錢，互相削价傾銷，并用大減价、大賤卖作虛偽号召，爭夺营业，还要挖用女售貨員相互标榜。我們更漠視职工的生活，在每年大年夜那天，随便解雇职工，那时职工的职业是毫无保障的。此外，我們还把永安企业的股票在証券交易所流通，买进卖出，企图通过投

机賺些鈔票，但是被官僚資本操縱了，一時漲停板，一時又跌停板，連我們自己也控制不住，賺錢的希望自然落空了。

我在解放前聽到“共產”兩字，的確也有些畏懼，以為共產黨來了，產業要“共光”，資本家是沒有前途的。上海解放前夕，我的上一輩也曾為我預備飛機，要我到香港去，但是我沒有去。我不肯離開上海的原因是由于我的家族觀念很深，我是郭家門里第二代的第一个老大，應該留在上海負責維持有“傳統性”的企业，而且上海是在我的祖國里，所以我堅決不走。

永安公司既是在半殖民地旧中國生長的，它的經營管理方式必然是資本主義腐朽落后的一套，盲目競爭，追逐利潤，你爭我奪，唯利是圖。解放以後，這些腐朽落后狀態也就完全暴露出來了，同時正因為趕不上時代的需要，當時發生了很多困難，如機構臃腫，開支龐大，收支不平衡等等。面對着這些問題，我覺得很傷腦筋。我對新社會認識不夠，常用旧眼光看新事物，錯誤地認為國營中國百貨公司上海市公司在永安大樓開幕會影響我們公司的營業，居然在統戰會議上要求上級明確指示，國營百貨公司究竟還要開多少間。同時也產生了某些消極情緒，各種會議很少參加；那時我雖然有些懂得國營經濟的領導作用，但當我看到大新、新新、先施三大公司結束時，思想很波動，心想：不知道我們永安公司的前途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總任務頒布後，我開始糾正了以往的錯誤思想，消除了不必要的顧慮。那時永安公司在國家的統籌安排下，與國營企業建立了批購關係，我通過學習和感受，思想認識逐步地有所提高，認識到只有為接受改造準備

条件，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在职工的热烈支持和积极努力下，永安公司作了一些改革改造工作，结束了一些不利于国計民生的附屬事业，在經營管理上也作了若干改进。尤其是自1955年3月份开始与国营公司建立了經銷代銷关系以后，营业情况更見好轉。但是改进企业工作做得还不够，尚存在着很多困难，这主要是由于企业性質还没有根本的变化。

为了更好地改造企业和改造自己，我們在1955年11月21日申請公私合营，第二天获得批准，从此永安公司納入了国家資本主义的高級形式。永安公司是在上海市工商业全行业合营以前第一批进入公私合营的，22日这一天，正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會議的“告全国工商界书”等文件发表的日子，我閱讀了文件更加兴奋，因为我感觉到我們的行动及时地符合了这次會議的精神。我在庆祝永安公司合营大会上无比愉快地說：“我已經乘上了社会主义的列車，一定要乘到儿孙幸福的站头。”

永安公司合营前夕，国营中国百貨公司上海市公司在一夜天里給我們运来了1,000多种商品，价值36万元。国营企业的职工同志們十分热情地支持和鼓舞我們。在批准合营后的10天比前10天营业额就上升了30%，以后营业更是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这是广大消費者把我們看成了国营商业的助手，使这个新生的企业真正能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永安公司自从合营以后，社会主义經濟成份居于领导地位。国家信任我們全体私方人員，安排我們参加了企业的經營管理工作，职工們發揮了积极性，提高了服务質量。为了适应人民的需要，延長营业时间，繁荣上海夜市；在花色品种

上达到 33,000 种，比合营前增加了 175%，商品庫存量增加了 5 倍以上；1956 年的全年营业额比 1955 年增加了 193% 以上，最高一天的营业额达 128,000 元。在合营仅三个多月，就已扭轉了 8 年来長期亏损的局面，由保本到逐月盈余。合营的第一年就盈余 50 多万元。現在永安公司貨源充沛，已經成为一家公私合营的綜合性的百貨商店。針棉織品、日用百货、文具、紙張、电器、五金、新葯、南北貨、呢絨布匹、家具、鐘表、服裝、水果、糕餅等 35 个营业部門的商品把所有的貨廚貨架都摆得滿滿的，这是永安公司 30 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現象。

1956 年我們建立了进货、銷貨和庫存等一系列的經營管理制度。同許多工厂、学校、医院等單位訂立了結算協議書，扩大和改进了原来的邮售服务，电话送貨，送貨收款等方法，服务对象不仅在于上海，而且遍及新疆、西藏、黑龙江、海南島等边远地区。

当企业合营批准后，我觉得千斤重担放下了，职工工資和个人薪金固定可得，企业經濟沒有困难。但在合营初期还有些耽心，不知道清产核資下来有多少私股？股息又怎样？清产的结果，永安公司资产还是 750 万元，这与 1952 年重估财产时的产值相等。公司亏蝕了許多年，現在我們对股东还好交代，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政府宣布定息 5 厘，这真是出于我們意料之外，我衷心地表示拥护和万分感謝党和政府对工商业者的关怀。我相信政府关于定息的这一賢明措施，必定会获得国内外华侨的热烈拥护，激发他們的爱国主义热情，从而更为踊跃地投資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因此，我曾写信給国外华侨股东說：“我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向您們报道

永安公司的喜訊，我公司深受人民政府的扶植，公私合營以來營業驟升，已迅速扭轉了虧損，轉為獲有盈餘，永安公司清產核資後的淨值仍與原來的股本 750 萬元相等，定年息 5 厘，股東有息可收”。

永安公司合營後，黨對企業的領導工作有了加強，使我們完全能夠根據政策辦事。例如：在人事安排上，對私方人員是就原有工作職位來作適當安排，我們提升了一些具有政治水平、業務經驗的職工擔任科室和小組的領導工作。

公方代表和私方建立了經理碰頭會議制度，每周開三次，凡是有關企業的重大問題，如提升幹部、調整營業部門的勞動力、實行分班制、安排工時以及職工福利等，都在碰頭會上進行協商，大家開誠相見，說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經過認真研究，意見統一後，才作出決定貫徹下去。這樣使我們私方人員感到有職有權。此外，還定期在每星期三舉行科長例會，各科匯報業務工作情況，同時對於應興應革事宜，大家也鑽研討論；討論中，如有不同的見解，大家都能听取對方的更好的意見，修正自己的看法，妥善地把每一個問題得出合理的結論，保證搞好工作。因此，密切了公私關係，真正地做到溝通思想、相互幫助。

我們在布置季度商品流轉計劃和工作總結時，領導經常深入小組；並且行政與工會結合在一起召開組長和職工大會，充分發揚民主，听取群眾的意見，採納合理化建議。如業務科將採購組下放到商場科，使採購人員與商場營業部門直接取得聯繫，減少層次。從 1956 年 4 月份起精簡管理部門編制，陸續抽調人員至商場。我們不斷地挖掘企業潛在力量，改

进企业的經營管理工作。我們对于职工的福利問題，办得到的馬上就办，一时难以办到的，向职工进行解释。

在各种會議上，公方副經理一貫抱着謙虛誠懇的态度，他很尊重行政制度和行政上的权限，使我能够安排時間，做到生产經營与社会活动兩相兼顧，并且总是讓我主持會議。对于上級領導机关召集的有关业务、行政方面的會議，公方代表也都讓我們私方人員一道参加，这不但使私方人員更好地了解政策，而且对社会主义經營知識也有所提高。

公方代表与我們私方人員不仅在工作关系上搞得很好，而且公私双方在学习上也配合得很好。如公私双方一道編組学习“八大”文件以后，我們就結合实际改进各項領導工作，如精簡會議、提高會議質量等。公私双方在相互友愛上也表現得很好，公方代表和职工會到我家里举行春节联欢，工会举办的时事、科技講座都經常邀請我們私方人員参加听講。在文娱活动方面，象工会搞的联欢会、郊游活动等，都邀請我們共同联欢。

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职工們协助私方做出成績，使大部分私方人員連續評上了獎。我曾經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公私关系座談会上这样說：“我們的团結，与公方是公私不分，与职工是同一陣綫”。这說明我們公私关系是很融洽的。

永安公司在私营时期原有职工 1,146 人，因为那时企业經營管理不善，营业情况不佳，劳动力有过剩現象。合营以后，营业大大发展，获得上級的支持，还增添了青年职工 234 人。全体职工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創造性，在去年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組織訪問工作队了解消費

者的需要，并分批到国营商店去学习招待顧客、推銷商品的方法。因此在服务态度上有了显著改善。我們推行了商品定位定量，建立了永續盤存制，之后又推行数量金額核算制和小組营业責任制，使差錯事故有了减少。在增产节约方面，1956年的費用平均只占营业額的 8.11%，較合营前降低了近兩倍。今后我們还要繼續大力开展增产节约。

总之，企业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經營管理制度的优越性；而党和政府的加强領導，公私双方共事关系好，以及职工群众的努力，这是永安公司合营以后所以取得以上初步收获的主要因素。

三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自从 1955 年实现对私营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在国际上起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說是一个彪炳寰宇的大事情。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实现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逐步贖买的政策，是一个更无前例的創举。这种政策，受到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贊揚，其他一些国家的各阶层人士也很感兴趣，因而許多国家組成了代表团接踵来到我国考察訪問。永安公司在国际上稍具薄譽，来訪的各国人士不少，我由于工作关系，荣幸地招待了許多外宾和海外侨胞。例如有不少苏联專家和記者，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記者要我談一些作为一个資本家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和靠攏共产党，以及如何能够抱着很愉快的心情愿意放弃剝削的問題。我所談的一些情况，苏联星火杂志和一些报纸，用着很多篇幅刊载了。

記得有一次，在巴黎出版的“國際展望”上登載了題為“中國資本家郭琳爽”的文章，內容是：從我上輩歸國創業的遭遇起，直到解放後我怎樣通過一系列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事物的生動教育和六年來政府怎樣關懷、培養我，等等。有位法國共產黨書記來到中國，也到永安公司訪問，我和他談了話。在開始談話時，他希望我多談實際情況，少說理論，所以我沒有講大道理。當時我講的是企業合營前的困難情況，及合營後的許多收穫和新鮮事例，如營業數字不斷提高、商品品種的增加和職工服務態度的改進等等；也談了個人在思想意識上接受改造的經過。在結束談話的時候，我曾經說過一句理論的話，那就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公私合營，體現了社會主義經營管理制度的優越性”。這位書記同志由衷地表示同意，而笑了起來，並祝我們前途光明，不斷進步。

又如：緬甸和平代表團聽了我講國家對我們的企业加強了領導和管理，使廣大消費者把我們看成國營商業的助手，真正能為國家和人民服務。他們對於企業合營公私雙方所簽訂的合約，特別重視，要我把內容翻譯一下，逐項仔細地記錄下來。團長還說：“回國以後，要向國會提出建議，也要學習我們這樣來做”。這証明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人士，對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和平改造感到莫大興趣。因此，我們不僅要把自己的才能貢獻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且要進一步聯繫實際介紹經驗，使外國工商界朋友，更加正確了解我國和平改造的政策和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

我還招待了來自印度尼西亞、突尼斯、以色列、加拿大、挪威等國來我國訪問的人們，他們都感到人民中國到處都充滿

着幸福的气氛。但是他們对于中国資本家为什么肯放弃生产資料覺得惊奇。我向他們解釋說：“在旧社会大家以为資本家有了生产資料就可以多做买卖，能够多賺錢。总以为錢多了勢力也大了，儿女們也不用愁生活了。其实不然，在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資本家，不但动荡不定、錢多了怕綁票，还要遭到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压迫和摧殘，自己也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今天的新中国，物价稳定，資本家生活过得很好，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顧，都能够安居乐业，孩子長大以后，国家会替他們安排工作。因此生長在我們新中国的青年，再也不要繼承剝削可耻的遺產，也不要做資本家了，肯定將來还会享受到比現在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为了热爱祖国，我更應該要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密切的結合起来，充分發揮自己的积极作用，所以我极愿意脱离生产資料私有制，走社会主义道路，把自己改造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客人們听了我这番話，都頻頻点头。有的問我：企业在沒有公私合营前的情况怎样？我說：过去由于經營管理制度的腐朽，以致困难重重，每天总是愁眉苦臉的回家，受人看到我也是愁眉苦臉。合营后可不同了！資金周轉灵活，貨源充沛，不但工資和国家稅收能按时繳付，而且还有盈余。国家还給我們定息。現在我每天回到家里，我夫妇倆內心就覺得无比的愉快。一位挪威女朋友很理解我的心情，她說：“我有个女婿在挪威開設商店，碰到困难时，常常唉声叹气。如果我的女婿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那就不会叹气了。”从外宾的談話中，我体会到目前尚生活在資本主义国家里的工商界人士的不幸遭遇，根本和我們幸福的感受迥不相同；同时我也認識了世界兩個

制度的和平竞赛，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社会主义。

印度尼西亚和突尼斯朋友过去听说中国共产党反对宗教，到了新中国看到庙宇教堂以后，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我告诉他们我是基督教徒，每个星期都到教堂里去做礼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信仰宗教的客人听了感到非常满意。

我在多次招待日本外宾时，他们谈到日本大小商店之间相互竞争的风气甚熾，問我們有沒有竞争？我說：“在我们国家里，人民政府贯彻了统筹兼顾、合理调整商业网的政策，我們已經各得其所了。我們现在是相互之間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而不是‘彼此争夺营业’了。”他们感到钦佩而富有兴趣。还有许多外宾到我家里，看到我在花园里种植花卉、饲养小鷄。另外有一次，我在杭州碰到几位印度国会议員，他们怀着好奇心問我：你也有机会来杭州游山玩水嗎？我說我每年至少有一个星期来杭州西子湖游覽休息的。外宾們看到这些事实，更相信我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和平改造，是真正愉快的。

我还招待过很多海外华侨。有些是新加坡、馬來亞的侨胞，他們在未来祖国之前，認為祖国的资本家会心甘情愿自己申請公私合营是一个奇迹。訪問后有些人回到新加坡时，給“星州日报”写文章，介紹我們和平改造的情况。文章談到：永安公司公私合营是很順利进行的，这非凡的成就不由令人惊奇。現在国家和资本家共同参加企业管理，而资本家有一定的定息。政府与人民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家是采取适当的講理和有步驟的解决問題，这种办法使人人信服，大家都乐意为建設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

1956年12月我出席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会上有位政府领导人启发我们私方人员写一个新的座右铭，随时警惕自己，不要放松。我觉得很对，就根据会议讨论五项准则时谈到的一些内容，写了28个字的座右铭：一靠二学三重视，四近公方五服从；六戒骄奢七尽责，八勤九爱十防松。意思是：依靠工人阶级，学习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重视职工群众的意见，接近公方主动搞好公私关系，服从上级领导，勤俭办企业，爱护社会主义企业，最后是防止松懈思想。这就是我最近的认识和努力的方向。由于党与政府的教导，鼓励我进步，今后，我还应该继续加紧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思想认识，与全国人民一起向着美好幸福的前途——社会主义社会迈进！

一条心，一条路

孙 照 明

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代，每一个人都亲眼看到了周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的国家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独立、自由的国家。全国人民都在为最后消灭剥削与贫困，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我们民族工商业者几年来由于事实的教育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看清了方向，坚决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愿意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当然，由于我们过去所处的经济地位，思想的发展不免是迂回曲折的。现在让我结合过去的情况，来谈谈我所经营的企业和我个人的变化。

“协大祥”、“三大祥”

上海綢布业的“三大祥”，以“协大祥”创始最早。距今45年前，我的父亲与合伙人集资1万两白银，在上海小东门开设了“协大祥”。时当清末民初，外国商品通过上海大量输入我国，所谓十里洋场，实际是洋货倾销的市场。那时“协大祥”所经营的布匹有80%是洋布，国产布匹只不过20%左右，所以招牌称做“洋布庄”，与后来的“綢布庄”有一字之差。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旧中国商业的性质，它是为外国商品倾销而服务的，

它給外国資本家裝滿了口袋，自己則从中分其余瀝。

小东門原来是魚类和菜場的集散地，外埠輪船大多停靠在这一帶，本幫和客幫办貨集中在这里，真是万商云集。“协大祥”选在这个好地段，經銷的洋布又是暗門，利潤极厚，因此年年获利，月月賺錢。10多年后，資本就积累到10多万兩白銀，成为同业中的巨擘。在旧社会里合伙开店，各有各的算盤，股東們看到錢賺多了，就鬧意見，一部分股東拆出，在“协大祥”隔壁開設了“宝大祥”；之后，又有一部分股東開設了“信大祥”，各自凭借雄厚的資金，相互竞争。从此小东門一帶兴起了“三大祥”的市面。抗战时期，市民集中在上海旧英、法兩租界，“三大祥”又逐步伸張到市中心区，在八仙桥和南京路開設了支店。

竞争与排挤

“协大祥”为了拉攏顧客，首創“足尺加一”的办法。自从“宝大祥”一开，竞争便剧烈起来了，从“足尺加二”攪到“足尺加三”，造成了以后几十年来全市甚至各地同业的放尺陋規，直到解放以后才廢除。其实所謂加一加三，都不过騙騙顧客罢了，就以当时的熱門貨日本玄色直貢呢來說，进价每尺一角五分，足尺加三，成本还不到兩角，而卖价統扯每尺二角五、六分左右，仍有五分鐘的利潤。羊毛原是出在羊身上（那时“协大祥”平均每天卖出直貢呢40多匹，淨賺白銀100兩，仅此一項，足够开支有余）。那时除用“放尺”的办法来拉攏顧客外，还有許多新花样，例如：周年大减价、特別大放盤、廉价品、牺牲品以及贈券、摸彩等等，同业相互效尤，蔚成一时风气。

“协”、“宝”兩家竞争愈烈，賺錢愈多，倒楣的是小同行。他們資金短，花色少，經不起这种竞争排挤的风浪，便一家家倒閉了。小东門一帶五、六家同业，有五家相繼歇业；后来“三大祥”发展到市中心区的时候，金陵路一帶的同业也受到了这种竞争风浪的襲击，他們有的門庭冷落，有的歇业，有的奄奄一息，无法維持。过去，我們根本不懂得什么資本主义盲目竞争的法則，只知道自己多做生意多賺錢，不管同业的死活。解放后通过学习，才認識到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同业之間必然是相互排挤，盲目竞争，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这也就是个人发财、众人倒楣的道理。“三大祥”的成長与发展，就是一个鮮明的例子。

壟断与投机

我16岁到“协大祥”，跟父亲学业，19岁滿师。当时所看到和学到的，无非是种种欺騙顧客的手段和排挤同业的方法。20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当上了“协大祥”經理，为的是克紹箕裘，光大父业。这时資金已积累到六、七十万元，一部分股东要求拆股，仅“协大祥”这块招牌，就作价128,000兩白銀。我年事虽輕，却怀着自己的“抱負”，要在同业中出奇制胜，独占上风，不但壟断銷貨，还想壟断进貨。我父亲在世时，已向个别染織厂投資，到我手里，范围更加扩大，有好几家染織厂，“协大祥”都占了大股，这些厂出产的布匹，大部分由“协大祥”包銷；新的花色品种尽先供給“协大祥”，要多少是多少。“协大祥”又用定貨方式向工厂进貨，或利用五荒六月，向有困难的小厂低价进貨，把各厂生产的大部分布匹抓在手里，低价买进，高价

卖出。到抗战时期，又陸續投資開設了七、八家銀行錢庄，自己担任董事長、常务董事等等职务，以便調用資金，控制物資。

“宝大祥”当然不肯放松，他們也壟斷了几种布匹，独占利潤；又在小东門一帶開設支店，有所謂西号、南号等等，对“协大祥”形成了一个包圍圈。于是，竞争的花样便发展到房屋方面来了。我首先設法把“宝大祥南号”的房屋向原主挖下兩間，開設“协大祥新号”，弄得“宝大祥”原来是五开間門面的招牌不得不砍掉一段，只剩下五分之三。当支店发展到市中心区以后，我又用重价把“宝大祥”八仙桥支店側面的房屋拿下，使它的店面无法扩展。从此兩家仇恨愈深，股东成陌路，同行变冤家。直到解放以后，我們才消除了这种盲目竞争的現象，真正言归于好，重新团結起来。

不能掌握命运

我这样費尽心机来巩固自己的壟斷地位，以为是泰山之安，磐石之固。但事情却不是这样。敌伪統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大肆掠夺，强迫收买紗布，全行业遭受到严重的損失，我們几家大戶損失尤重，“协大祥”一家就損失棉布3万匹，約值現在的人民币90万元。后来在国民党統治时期，又遭到“金圓券”之难，損失棉布3万匹，占当时企业全部資產的一半以上。我投資的几家工厂同样受到搜刮，如我負責的鼎新染織厂原有四、五万匹布，在“限价”时期几乎全部搞光，給“协大祥”帶來了严重的困难。

這兩次大风大浪，几乎使我傾家蕩产，至今想来，犹有余悸。从这里，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教导我們的話，在旧中国，

任何人都沒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的血腥統治和殘酷掠夺,不仅使广大人民过着悲惨黑暗的日子,我們工商业者的命运也一直在風雨飄搖之中。只有在解放以后,我們民族工商业者才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的压榨,才知道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动摇到安定

从解放前后到抗美援朝,中国发生了一連串天翻地复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我的思想上,可以說是从动摇到安定,从怀疑到信仰。事实是最好的教育:共产党来了,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我照旧經營“协大祥”,而且生意很好。共产党把民族資產阶级团结在統一战綫之内,上至国家大事,下至企业經營,都是协商了再办;企业内部の劳資矛盾,也是劳資双方协商解决。这样,解放前所听到的那些惡毒的謠言,很快地被鉄的事实粉碎了。

上海在“二六”轟炸以后,市面一度不正常,部分工厂生产发生困难,当时便有人說:“共产党政治上有本領,恐怕經濟上沒办法”。当时我也有这种看法。我經營的鼎新染織厂,在“金圓券”时期已全部搞光,几年来靠借貸周轉,市面一停頓,貨色卖不出去,工厂便发生了困难,織、染兩厂 800 多工人瀕于停伙。我是工厂負責人,除了从“协大祥”搬些錢去临时应付外,一时想不出办法,便一溜烟到了北京。在北京住了 3 个多月,看到首都市面繁榮,政府工作人員都廉洁奉公,埋头苦干,与国民党統治时期截然不同,使人自然地感到有一种新鮮的朝氣。3 个月后我回到上海,还是怕工厂困难,不敢去过問,可

是厂里的情况竟使我大吃一惊,由于政府的贷款加工,帮助维持,原料也有了,资金也有了,存货也有了,而且比过去大大活络了。仅仅3个月,就变化得这么快,这么大,使我不能不相信:共产党不仅政治上有本领,经济上同样有办法。

抗美援朝运动刚开始,我心里有些怀疑:“这样年轻的政权,能对付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吗?”可是事实证明,我们不仅对付得过,而且赢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是长时期来受尽屈辱的国家,反动派碰上帝国主义国家,不是叩头哈腰,就是望风披靡。共产党领导中国不到两年,竟能创造这样的丰功伟绩,给6亿人民扬眉吐气,我自己也觉得昂然地站了起来,就这样我安定下来。

积 极 經 营

安定下来以后,我便专心经营“协大祥”,因为看到政府这样的对待我们,自己觉得只有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才能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也才真正称得上一个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1950年初暂时发生的经济困难,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迅速地克服了,市面正常,物价平稳,各行各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以“协大祥”来说,也出现了新的情况,首先经营的商品在变化,解放前还有30—40%是洋布,这时国产布匹已占90%以上,逐步地走向为国内的生产、消费而服务;其次经营的作风在变化,几十年来相沿成习的放尺陋规和其它虚伪欺骗的作风废除了,货真价实的风气逐步建立起来了;同时企业内部的管理也起了显著的变化,过去的所谓管理,实质上无非是限制和剥削职工。“协大祥”是几十年的

老店，年复一年地积累了許多剝削职工的經驗，所訂店規多至160余条，其中有所謂“晨起獎”、“作輟獎”、“对复賬獎”、“升工”，等等名目，名为獎勵，实际是加重职工的劳动强度，延長职工的劳动時間，并限制职工的活动。职工触犯店規的，店里不用說明理由，可以任意解雇。一年三节，职工比做“过三关”，耽心賬房間貼出紅紙条歇生意。这种不合乎情理的老店規，通过劳資协商逐步加以修改或廢除了，劳資之間逐步建立起民主、平等、兩利的关系，职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我自己的生活在变化，过去我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人家称我“小开”、“纨褲子”，而現在則經常到店，关心企业的經營管理，并参加社会活动和組織領導的学习，生活一天天正常，思想也一天天开朗了。

这些情况，說明企业和个人在向着新的方向发展，其所以如此，應該感謝共产党和政府的教育，感謝职工的帮助与組織的培养；特別是偉大的“五反”运动，使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从此我在思想上認清了过去那种骯髒丑惡的东西，从而为拥护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大 照 顧 小

1954年秋季，国家实行棉布計劃供应，全市棉布店納入国家資本主义軌道，与国营商业建立經銷关系。在这以前，棉布业与国营商业已建立了批購关系，在貨源分配問題上，我曾經思想波动。当时，自由市場已經消失了，国营商业分配貨源，一般照顧小戶、困难戶。我的看法是：小戶关下来，影响不大，如果大戶不能維持，將影响到数百职工的生活，認為政

府的措施好象是顧此失彼，因小忘大。其实，当时“协大祥”的业务还是高于一般同业的，我只是从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看問題罢了。政府首長說：“社会主义要人人好，不是一个人好；要全行业好，不是一个企业好。目前中小戶有困难，應該从大照顧小、从帮助困难戶出发，使大家都能維持下来。”这話給我很大的帮助。我把兩種社会对比一下，从前是大吃小，而現在則是大照顧小。認識了这个道理，心情就覺得很自然，願意帮助同业，使大家得到維持。

解放以前，“协大祥”依靠某些布匹的独占利潤，生意大，开支大，自以为大来大去，滿不在乎，无形中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开支比一般同业要高出 30%。我分析了这些原因，便着手研究改善經營管理的方案，并把它提出来与职工协商，果然得到职工的全力支持，順利达成協議。新方案实行后，每月开支从 8 万元降至 63,000 元，其中仅另剪損耗一項，就从原来的 1% 减低到 0.57%，以全年营业额計算，无形中節約財富 10 多万元。由此体会到：政府政策不仅为照顧小戶、困难戶，同时更有着促进改善經營管理的积极意义，使我們注意到精打細算，减少浪費，为国家節約財富，极累資金。这里还应该提到，由于同业体会这一精神，不再盲目竞争，全业真正团结起来了。几十年的老冤家“协大祥”和“宝大祥”重归于好，在研究改善經營管理时交流經驗，开誠相見，取長补短，共同提高。

大胜利与大喜事

上海市資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的高潮是工人阶级的大胜利，也是我們工商业者的大喜事。

我們棉布业全业公私合营，是在高潮以前。那时，北京市棉布业已經批准公私合营，同业听到这个消息，紛紛到同业公会詢問，他們說：“上海棉布业第一个挂出經銷牌子，这是全业的光榮。現在北京同业又走前了一步，我們几时才能爭取到公私合营呢？”我是同业公会主任委員，自己对公私合营早已有着迫切的期望，听到同业們这样反映，更覺得全业公私合营的时机已經成熟，刻不容緩。因此，同行业的骨干仔細研究，向政府提出了全业改造的方案。当这个方案得到政府同意的那天，全市 349 家棉布店的全体資方，分別集中在各个地区，立等好音；仅在两个半小时以內，全体同业自願的办好申請手續，由同业公会汇送政府，得到政府正式批准。

公私合营是从資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步驟。工人階級以消灭剝削、建立沒有人剝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目的，他們对于公私合营当然是热烈欢迎的。我們工商业者本身是剝削者、生产資料的私有者，为什么也把公私合营看做大喜事呢？以我自己的体会，有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几年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對我們进行了思想工作，使我們真正認識到剝削的可耻和資本主义的腐朽落后。解放以前，不論大小同业，一般都亲身經歷过一段痛苦的过程，自己昧心剝削得来的錢，不是落入大魚之口，就是落入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家之腹。資本主义是一条死路，誰还願意走死路呢？第二，中国并不是首創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幸福生活，已給我們作出了榜样。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个人好，而且人人好；不仅自身好，而且子孙好。我們过去經營工商业，既为自身打算，亦为自己的子孙打算，但子孙如果不好，

錢多仍然一場空。現在自身乃至子孫萬代的幸福都有保障，我們怎能不向往社會主義呢！第三，政府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深入人心，它既保障我們的生活，安排我們的工作；又給我們指出了前途，讓我們同全國人民一道，逐步向社會主義社會邁進，共同享受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這就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為什麼以敲鑼打鼓、歡欣鼓舞的心情來迎接公私合營高潮的道理。

棉布業全行業公私合營後不久，就解決了過去同業中所存在的沒法解決的問題。例如：合營前全市棉布店的分布網不合理，資金、勞動力和業務不平衡，那時同業公會雖然作出了調整的規劃，但因生產資料私有制的限制，無法實行。合營以後，全業的分布網逐步得到了調整，資金和勞動力全面規劃、統一調配，既有利於供應消費者的需要，也有利於業務的發展，全業營業額比合營前增加了30%。

踏 上 新 崗 位

棉布業全業合營以後，805個私方人員都得到了妥善安排，我自己被安排為國營專業公司零售業務部副經理。一個資本家當上國營企業的領導幹部，這時的心情是很難描繪的，正如俗話所說，一則以喜，一則以憂。自己思忖：過去經營“協大祥”，連勞資雙方在內不過348人，現在却要去領導全市349家同業；過去的企业是資本主義性質，而國營企业是社會主義性質。企业的性質不同，工作的內容和方式方法都不同，這就使我感到茫無頭緒，耽心搞不了。但是，我參加工作以後，公方代表處處給我支持和幫助，甚至對生活細節亦關心備至，

使我一点不感到陌生。公方代表指示我：工作要由粗到細，从簡單的工作做起，逐漸做到細致。要由生到熟，仔細研究內部文件和行业資料，就能逐步摸清情况。我們私方人員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如平时与同业接触頻繁，行业中存在哪些問題，心里大致有数；过去長时期經營企业，业务比較熟悉，也了解消費者和时令的需要。全行业虽然公私合营了，原来存在的問題不是一朝可以解决的，我們就應該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与公方領導研究，使它逐步解决和逐步改进。我从这几方面着手，經過几个月的琢磨，对新的工作也慢慢摸熟了。后来政府又把我提升为專業公司副經理，自己感到責任更加重大，但我打定了兩個主意：第一，要善于向公方学习，学习社会主义的經營管理方法和实事求是、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以便在工作中增長學問，練出本領。第二，自己原有的一些經驗，要仔細加以区别，哪些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應該毫无保留地貢獻出来；哪些是沒用处、甚至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應該坚决地加以揚弃。我一定坚持不懈，加倍努力，来报答政府对我們的重視和培养。

西北參觀后的感受

1956年8月，我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上海市委員会組織的西北建設事业參觀团，亲眼看到了西北各地規模宏偉的社会主义建設，不但使我大开眼界，也使我的思想进一步开展了。解放以前，西北地区長时期受着反动統治的禍害，广大人民过着悲慘黑暗的日子，素有“穷山惡水，地瘠民貧”之称。可是解放仅仅7年，情况已完全改观。那些原来是古老破

旧的一些城市，都已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城市了，工地上日夜开工，夜晚电炬通明，照耀得如同白昼，到处是：荒山成宝库，平地起高楼。我参观过许多巨大的工厂，在厂里环绕一周，往往要费去几个小时，工程之大，非可想象。我也到过湍流滚滚的黄河岸边，看到三门峡水利枢纽，光是一个水库就占地 300 万亩，宛如内海。当我亲眼看到这么伟大的建设工程以后，不禁产生了几点感想：第一，国民党统治中国数十年，除剥削掠夺外，没有替人民做过一点好事，使人民的痛苦日深。而共产党领导人民掌握政权以后，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各种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的生活大大改善。我沿路所碰到的人们，都是衣冠整齐，兴奋愉快，回想到过去农村里小姑娘没有衣裤穿的情况，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第二，资本主义国家在旧中国开工厂，筑铁路，其目的是吮吸我们的膏血。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根本不同，特别是苏联给我们大公无私的援助，比之兄弟间的情谊更高贵，更纯洁。我在西北地区的伟大建设中，亲眼看到了这点。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的亲密合作，给予我们的真诚援助，与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奴役掠夺，又是一个鲜明的对照。第三，我们工商业者过去是生产资料的私有者，是剥削者，资金只是被利用作为剥削的工具；而社会主义的资金却全部用之于建设事业，为人民造福。再从数字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资产不过 22 亿元，而国家对建设的投资，仅一个三门峡水利枢纽就达 16 亿元；如果把个人所有的资产来对比一下，更觉得渺如沧海一粟，有什么可贵。由此，我更进一步的热爱社会主义，愿意放弃“小家私”，与全国人民共同来享受国家这一分“大家业”。

到西北參觀后，我另外还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过去經營商业，只是为利潤出发，一手进，一手出，看不到它对国家和人民有什么作用。而現在就不同了。以西北的蘭州來說，近年因建設的发展，人口急剧增加，而商业未能与之相适应，广大市民的生活受到一些影响。上海一批商店迁到那里以后，当地人民热烈欢迎，无不門庭若市，营业一般比在上海高出几倍，但还是供不应求。許多上海的老朋友到了西北，都起早落夜，积极工作，一点不感疲劳。他們說：一到西北，首先为偉大的建設事业所鼓舞，大家願意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們服务得好，使劳动人民的生活需要得到滿足，工作的积极性就格外高漲，社会主义事业就能提早成功。的确，这話是极有道理的，我們要加速建設社会主义，做好商业工作也是重要的一环。我是从事商业的，从这里更加体会到自己工作的重要，也更加提高了工作的信心。

心向社会主义

解放 8 年来，随着国家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企业的变化，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正是千千万万工商业者所发生的变化。这就說明我們国家所采取的和平改造的政策，不仅能够改造社会，而且能够改造人。

上海市資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高潮以后，有人譬喻說，中国民族資产階級的一只脚已經跨进了社会主义，另一只脚也非跨进去不可，这是大势所趋。以我自己的体会，不仅是一只脚，連一顆心也自然地跨进社会主义去了。我們——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同全国人民是一条心，走的是一条路。

始終不渝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簡 日 林

我是怎样决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对我来说，的确不是簡單的一回事。几年以前，我根本想不到、也无法理解这个问题。这几年来，我的思想转变过程，真所謂“說來話長”，是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

这先得从我个人兴趣說起。我生長在一个民族工商业者的家庭里，可是从小不大欢喜办工厂、做买卖。認為中国之所以比人家落后，是由于科学技术不如人，所以我选择了工程作为我的專業。由于战事的延續，我被阻留在国外很長一个时期。在这期間，我参加了若干工程工作，担任过繪图員、設計員、工程师等职务，并且也成家立室。那时我虽然寄人籬下，到处被歧視和冷遇，但生活仍相当安定。抗战胜利后，知道我們家族中的先輩創立在上海的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已被官僚資本盤据。这个业企，是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們远在清朝末年——1905年时創立的，开始时由于資金短絀和技术缺乏，失敗了好几次，直到民国成立后，由于海外侨胞受到爱国情緒的鼓舞，对国貨极为欢迎，业务才逐步好轉起来，而且得到不少发展。可是帝国主义者不願看見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不惜采取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打击中伤，企图达到他們并吞的目的。几十年支撐过去了，可是已經筋疲力竭，被早

已在旁觀覬覦的宋子文，利用公司周轉不靈和人事不調的時機，用低價收買了一部分股票，乘機插足其中，而且長期地掌握了整個公司的支配大權。當時家中老的老了，小的太小，都寄望着我能夠回來和人家爭一席之地。為了看看多年闊別的祖國，也為了不忍拂逆慈母和叔父的意願，我在1946年底回到上海。1947年初，我進了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擔任了協理的職務。所謂“協理”，不過是一個空名罷了，以我一個剛從國外回來的年輕人，既無吹拍鑽營的本領，也無顯達的親友做靠山，凭什么和人家爭呢？企業內從總經理到各部門的負責人，幾乎全是宋家的親信爪牙，本來在公司服務多年的較為高級的職員，都一一被他們用種種辦法擠走了。什麼事我都管不着，管不了。我主管的是“計劃”，試問在那時有什麼計劃呢？還不簡直是笑話！當時的社會，更是暗無天日，物價奔騰，國民黨政府腐朽無能，貪污盛行。有時我想：我到底回來得對嗎？“祖國”，實在是太令人失望了。

1948年，官僚資本眼見大勢已去，便作有計劃的撤退，並有意把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資產逐漸全部轉移到海外去。為了照顧家族的利益，我也隨着南遷，最後停留在香港。由於形勢發展得極快，大陸各地相繼解放，官僚資本的親信覺得香港也站不住了，於是在1950年逃的逃、跑的跑，各自遠走高飛。

1950年底，我終於在親友的敦促下，從香港回到上海來協商企業改組和合營的事，那時我是抱着極大的顧慮回來的。大陸已經解放了一年多，人民政府把官僚資本家趕走了，把多年來壓在我們企業头上的石頭去掉了，這的確是大快人心的

事。但是我們又会怎样呢？是不是也可能会被同样对待？当时香港流傳着各种各样的謠言，說什么，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等等。我虽然不相信“共妻共产”的謠言，但总觉得共产党是要打倒資本家的，作为一个資本家的身份回去，会对我怎样？很多人都說国内如何如何困苦，是否今后只能过粗衣淡飯的刻苦生活，不能有一些享受和娱乐？但我想：別人說的总不能全信，我終于决定回来看一看。这不是說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了什么認識了，而只是为着家族的利益，同时也因为看到我的70多高齡的叔父——玉阶先生，他不辞艰苦、冒着危險从香港秘密地乘坐貨輪到东北，还帶着多年未根除的攝护腺病症，衰齡弱体，也不畏長途跋涉几經輾轉才抵达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屆全体會議。他这种爱国的举动感动了我，同时他回国之后，屢次写信告訴我国内种种欣欣向荣的情况。这促进了我回来看看的决心。

最初，也仅仅是抱着“看看”的心情回来的。我想：或許我仍改回本行搞些工程事务，或許在企业里干一个时期再說，甚至有这种想法，或許再出国去寄人籬下。事实是最好的証人，証明了我的一切顧慮都是多余的，沒有根据的。我回来不久，公私双方就取得了融洽的協議，1951年2月，企业順利地正式改組为公私合营企业。共产党並沒有把我排挤掉，而是在信任我的基础上給予我一定职权，任命我为總經理。

企业合营后很快地就出現了新气象。“南洋”在解放前，已被官僚資本搞得仅具虛名，人事臃腫，业务衰退，工厂生产也是时断时續。解放后軍管时期，得到政府很多的照顧与扶植，逐漸地扭轉了盲目經營和長期亏蝕的現象。合营后更因为有

了各方面的配合，得到了中央和地方主管部門的關注，加上工人們積極勞動，很快從恢復到發展而欣欣向榮，出現了多年未有的景象。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也愉快地工作着，這不能不令我想起 1947 年初從外國回來時遭遇的境況，把它拿來對比一下，誰是友、誰是敵，也就涇渭分明，清楚不過了。尤其是國家在各方面建設的巨大成就，鼓舞着我們每一個人，祖國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更令我們曾經長期旅居國外的人，深為感動。一句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開始知道，我選擇的道路是選對了。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是合營比較早的企业，也是很早就體現了國家資本主義優越性的企业。但是合營初期，我還不能深刻理解國家資本主義優越性的本質，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為什麼會好？為什麼會和以前有這樣的不同？為什麼會出現了這許多新氣象？經過了總路線的學習，對於這些問題，才有了初步的認識。不過同時也引起了其他許多錯誤的思想，如“安於現狀”、“留戀現在”等等，覺得目前一切都很好了，不必再前進了。這實質上還是對社會主義認識不足，還是害怕社會主義對自己有所不利，害怕目前優裕的生活不能繼續維持下去，害怕有一天完成了歷史使命之後我們這批人還有什麼用，害怕改造的鬥爭太尖銳、太嚴厲會吃不消。忘記了在舊中國漫長的年代中受到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掠奪，忘記了我的前輩在艱苦的年代中歷受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忘記了這一切困苦的根本。

1955 年，我出席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時，聽到了毛主席教導我們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指示。

他的指示好象一盞明灯，指引着我們前进，也給我敲了警鐘，使我深深体会到“安于現狀”的危害性，也体会到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很好地結合起来的道理。也就是說，只有認清社会发展規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

几年来，我参加了一定的社会活动。除了自己的專業——卷烟工业——以外，我还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和归国华侨联合会担任了一些具体工作，并且常常接待外宾和华侨等等。这些活动不仅充实了自己，同时也教育了自己，使我深深体会到自己是整个社会中的一分子，是可爱的祖国中的一个公民，應該努力發揮积极的作用，才不負党的教育和培养。

1956年年底，我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會員代表大会上听到了傳達毛主席的講話，同时听到了陈云、薄一波兩位副总理的报告，使我又一次受了很大的教育，深深体会到党和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党是偉大的。政府对我們民族資產階級采取贖买政策，定息七年，为的是什麼？还不是为了使我們能够“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安心改造”，大众一心，共同努力，为着建立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么？

最近政府又任命我为上海烟草工业公司經理，給予我的榮譽是太大了，使我感到又慚愧、又感動。更使我感触的是，今天我們办公的地方正是以前的“頤中”——英美烟公司——大樓。正是我現在坐的房間里，当时坐着他們的“大班”，指揮手下的嘍罗，每时每刻想着摧毀我們的企业。他們把我們的香烟放霉了之后唆使小販到我們公司調換，他們制造借口說我們的商标是模仿影射的，他們派出买办走狗建議收买我們

的公司，凡此种种，层出不穷。

解放前我們和頤中英美烟公司斗争了几十年，沒有絲毫損害到他們，而他們反而天天的壯大了。我們却經不起他們的压迫、傾銷，一天天的衰落下来，終于被官僚資本控制了，搞到奄奄一息。解放以后帝国主义者滾蛋了，这座“頤中大樓”也不再是帝国主义者发号施令来榨取我們人民血汗的地方，而是我們人民企业的一部分了。我們的卷烟市場也不再是帝国主义者縱橫的天下。过去我国的香烟虽然說是国貨，主要的原料还是进口的，我們不过加工罢了，今天才真正称得起国貨。我的家族从事卷烟工业几十年，我的前輩从国外回来創辦事业，为了振兴国貨，堵塞漏卮，在旧社会里弄得焦头爛額。今天他們最大的願望實現了。要不是党和政府領導我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願望，事实告訴我們，也只能是空想而已。

我以前曾經不止一次地想过，我还是搞我的技术吧。有个朋友曾經半开玩笑地对我說：“你从前不是干过桥梁工程嗎？而你現在也在架桥，这是政府和工商业者之間的桥，祖国和华侨之間的桥。”当然，他这句话我是不敢当的。不过我想將來有一天，回忆到在这个社会主义建設的美好事业中，我也曾投身其中，也曾奔走过，也曾出过一点点力，流过一些汗，这將是我最大的愉快。所以，不管任何工作，只要是祖国需要的，我都乐意去做。

今天，我的家庭生活也是欢乐和丰富多采的。我的妻子在国外是学音乐的，現在在家教授学生声乐，并經常参加演出，同时还在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担任文娱活动的負責工

作。我的三个孩子,大的除在学校学习外,还在学习繪画和拉小提琴,女孩也在学鋼琴。我不用为他們操心,也从不为他們担心发愁,因为国家会給他們安排工作;甚至有时我真不禁羡慕他們,因为他們將來有广闊的前途,有更美好的生活。他們將是共产主义的建設者。

从国家,从事业,从家庭,从个人,都强有力地促使我:决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始終不渝!

把自己的一切獻給社会主义建設事业

湯蒂因

我今年 41 岁,計算起来,已往的岁月不算太長,也不算太短。在 41 个年头里,我已在工商界搞了 27 年。27 年中間,头三年是当店員,是一个被剝削者,以后的 21 年一直做老板,成为一个剝削者。直到 1954 年企业合营后,才逐步改变自己的剝削本質,向一个自食其力、名符其实的劳动者过渡。这个过程,現在回忆起来,是艰巨复杂的斗争过程。

一

我的企业不是祖傳的,而是我自己一手創立起来的。在旧社会里,人們創立自己的企业是很偶然的事。我那时是一个 17 岁的女孩子,女孩子在 20 多年以前,要自己办企业,現在想来,倒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 8 岁上学,13 岁高小毕业以后,就沒有上中学,其原因是:我的父母封建意識較濃厚,說女孩子迟早是別人家的人,不象男孩子那样將來要成家立业。我只有一个哥哥,父母重男輕女,不讓我上中学。那时我心里老不服气,想鬧独立,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过了一年,忽然在报上看到上海有一家文具商店招考女店員,我瞒着父母去投考,沒有想到竟被录取了。那年我只有 14 岁,从此就走入了社会。

当店員不知受了多少氣。有这么一件事使我永远不能忘記：当我开始站櫃台的第二天，有一位顧客問一樣東西，我答不上來，這人向我白了一眼，罵道：“看你这黃毛丫頭，既不會做事，又不配當花瓶。”听了這句刺耳話，我氣極了，可是也決不服氣，我白天工作，晚上回去，連夜念價目單，一個星期把几千種商品的價目都硬背熟了。可是顧客來买东西時，我只背得出價錢，却找不到東西在哪裡，還是不行。接着我就幫着整理貨櫃貨櫥，又幫着批發部配貨，這樣就一件一件熟悉起來了。原來我在高小時就做了兩年學校小商店的販賣員，賣的是鉛筆、抄本、橡皮、牛肉干、麵包，連販帶賣，算錢結帳都是我，從小對這一行就很有興趣，沒有想到出學校一年，真的當上了售貨員。因為我不服氣，想爭氣，所以工作很努力，第二年我就被提升為門市部主任。那時候我不僅很關心門市部的業務，而且也關心批發部的業務，更着重的是進貨部的業務，我的所謂關心，說老實話也就是“偷關子”，學本事，在舊社會學本事只能是偷偷的學。我還很注意從門市的顧客以及各地客戶來信中研究他們需要的貨物和花色品種，如果我們店裡沒有，我就把它統計出來。我給老板出過主意，進了几批新品種試銷，結果老板賺了好多錢，從此他更加信任我了，第三年又把我提升為進貨部主任。那時這家文具店——益新教育用品社是當時上海幾個大批發商店之一，它還兼營門市業務。我被提升為進貨部主任後，日常要接觸洋行和工廠的跑街，那時我還只有16歲，人這麼小，職權卻這麼大，開始人家也不大看得起我。我在工作上特別賣力，肯鑽研業務，進步是較快的。

因為我在業務經營上有些辦法，當時的上海世界書局要

開關文具部，想把我拉去，但被我拒絕了。我是這麼想的：做店員，我現在的職位已相當高了，薪水每月 30 元也是很好了，所以不願換一個地方再去當店員；我還這麼想：店員總歸是店員，要給人看不起，要受氣，尤其還要受老板的氣。看看老板坐着汽車出出進進，真神氣，每天吃喝玩樂，我早已打好了主意：要出去，就去當老板，這樣才可以揚眉吐氣。說良心話，那時候誰懂得剝削可耻、勞動光榮的道理。

二

“有志者事竟成”。到了 17 歲的時候，我真的當上了小老板。那是一個文具批發店，開在我自己家裡，資金只有 1,000 元。這 1,000 元當中，一半是我的積蓄，還有一半是用搖會的方式搖來的。由於我在益新教育用品社做過進貨部主任，洋行工廠都熟悉，部分商品可以賒欠，又由於我對各地客戶的情況比較了解，所以做起来倒也還順利。從這時候起，家庭生活都由我負擔了，我在家裡是一家之主，在店中是老板，就覺得再也不會有人看不起我了。實際上，舊社會里的婦女根本就不会有地位的。

“八·一三”戰爭爆發時，我的店已經遷到當時的上海英租界了。那時業務上遭到不少困難，因為我店經營的是批發業務，交通受阻礙，放出去的帳，也給戰火燒掉了，損失相當大，連生活也受到影響。

我沒有辦法，但急中生智，就裝了一批貨，帶了兩個店員跑到遙遠的昆明去開分店。那時是在抗戰的第二年，昆明市面真熱鬧，許多機關、學校、部隊、團體都遷到那里。我鑽了對

上海市面灵，进货快，又做門市又做批发，生意兴隆，財源茂盛，一下子成了暴发戶。可是“好景不常”，敌机常轟炸昆明，滇越鐵路也遭到无数次的轟炸，运输經常中断，我們积压在海防的大批貨物，付了許多仓租費、小費和运输費，但始終沒有运出去，到日寇在那里登陆时，169 件大箱的貴重商品都損失了。几年来的心血都換成了貨，原来是想搶运进来，大发其財的，結果搞得一場空，还負了債。

回到上海以后，資金枯竭，批发生意不能做了。为了維持全家的生活，我在 1943 年又開設了一个小門市部，零售一枝鉛笔一本抄本等，顧客都是些小学生。我是大生意做慣的人，做这种小生意老是觉得不称手，那时我对商业也开始厌倦了，想創辦本輕利重的小工业。我看到国产的自来水笔还不多，就想办一个鋼笔厂。而且我又想到如果先开了厂，产品銷不出，就要亏本，所以我倒过来做，向一家小厂包了一个牌子——綠宝，在电台上、电影院、路牌、报纸杂志上大做其广告，預备把牌子宣傳开了再来开厂，这样比較穩妥。果然这只棋子走得不錯，因为文具行业一向沒有做过这么多广告，我这样做居然大有苗头。这是在 1944 年。隔了一年，抗战胜利，我想这一下可以好好地搞工业了。誰知道胜利帶來的是灾害，美帝国主义的剩余物資压倒了我国市場，“派克”“雅飞利”滿街飞，国产品被压得沒銷路，老工厂都沒法維持，我再也不敢下手。一直挨了兩年，实在为了生活負擔重，不能再挨下去，就在 1947 年借了一些資金，买下了一个已停业的鋼笔小工业社，有 5 个人，8 部机器，連人帶机器并在我的文具店里，开起綠宝金笔厂来了。說起来也怪可憐的，8 部机器是裝在后厢房里，馬达电也

沒有，把小馬達接在電燈上面，裝配間在灶披間，連店員，加上我的父母親、嫂嫂都算是裝配工人，這樣，一個十幾個人的小工廠就誕生了。

因為“綠寶”的牌子已做出了廣告，所以銷路不差。那時鈔票不值錢，人民輕幣重貨，大家都想購買東西存起來。但是名牌貨一般人買不起，因此我們小工廠出產的自來水筆也應運而起，成為被搶購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生產也有了發展，職工很快增加到30多個，成為一個中型工廠了。可是偽金圓券的搶購劫風，把我的產品“限價”搶光了，連我們做金筆用的黃金，也被搜光，收下的“金圓券”卻補不到原料，等到買進原料，“限價”早就“不限”了，物價已經漲了幾倍，我吃了大虧，逼得我用高利借款，一天出一倍的利息，使我負債累累。1949年2月，企業因為資金周轉失靈，我不得不解雇了一部分職工，將原存的原料製成鋼筆後，七折還債權人，三成出售維持生活，以苟延殘喘。要不是那年5月份上海就解放，前途真不堪設想，因為那時我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

三

上海剛解放時，我不了解共產黨的政策，認為共產黨來了對資本家不利。但是我那時也根本沒有什麼資產了，自己也不承認是資本家，對共產黨雖有懷疑，但是對國民黨實在也恨透了，苦頭也吃夠了，所謂窮就想變，變也許就會通，我是懷着這樣的心情來迎接解放的。

真想不到，隨着上海的解放，我也翻身了！解放以後全國人民掀起了學習熱潮，自來水筆已不是少數人的裝飾品，而是

成为广大劳动人民学习、工作不可缺少的日常必需品了。自来水笔工业,在人民政府的挽救和扶植下,从奄奄一息中甦生过来,克服了困难,得到了一日千里的发展。1950年,政府配給我們黄金,产品由国营公司收購;資金不够,由人民銀行貸款。1950年,我的厂每月只能生产200打金笔,到1953年,每月就能生产2,200打了,增加了12倍;职工也增加了,生活福利也有了改善,年年有盈余。1952年我参加了偉大的“五反”运动,又在当年参加了第二届赴朝慰問团,到朝鮮前綫慰問中国人民志願軍,亲眼看到和听到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使我受到了最深刻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开始看到了自己的丑惡本質。我过去做生意只是为自己打算,从来沒有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己办工厂,从来沒有想到产品能不能符合消費者的需要,例如連自来水笔的最基本的毛病“漏水”到底是什么原因,自己也說不上来,从来也不去研究解决,所謂“出門不認貨,只要能賺錢”,这就是我的打算。在朝鮮看到不少志願軍同志的自来水笔有毛病,沒有地方修理,他們苦悶得很。有些志願軍同志对我說:自来水笔是我們向文化进軍的武器,太重要了,写不出来,象枪沒有子彈一样;我們买一枝笔不容易,可是坏起来太容易了。他們要求祖国的工业家多做更好的笔,来支援前綫。我听了以后臉紅到耳根,感到又慚愧又激动,說不出的难受。回到祖国我向同业傳達了志願軍战士的要求,同时决心要把自己的生产搞好。这时候我們全业不論大厂小厂出产的产品已經由国营公司包銷了,包銷后出現了新气象,同业間自由竞争沒有了,大家团结合作,互相公开技术,交流經驗。1953年,我的企业与兩家同业合并,成为一

个有笔尖设备的 160 个职工的工厂(北京还有一个 80 个职工的分厂)。企业合并后,资金、设备、人力、技术都能更好地加以利用,这就为逐步改进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打下了基础。

1953 年,我学习了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明确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的唯一的光明大道,于是便提出申请公私合营,在 1954 年,北京分厂和上海总厂先后被批准公私合营。企业合营后出现了新面貌。1955 年政府又根据大厂带小厂的方针,批准我们厂并入公私合营华孚金笔厂;在 1956 年全行业大合营后,又并入了 20 多个中小型工厂,现在我们的厂已经是拥有 800 多个职工的一个大厂了,它生产的英雄、华孚、新民牌金笔,不仅畅销国内各地,还有部分出口,厂里的面貌天天变,新人新事,层出不穷,这是我多少年来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四

近年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许多人士对于我们党的和平改造的政策都很关心,很感兴趣。他们来到上海,都要来参观我们的工厂,访问我们的家庭。他们向我们提出许多问题,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作为一个资本家,怎么能够把自己一手创办的事业,亲手交给国家,不难过,反而愉快?而且愿意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我们把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每当最后分手的时候,他们都祝贺我们,说我们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幸福的资本家”。我们怎样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呢?概括的讲,我们总是把四笔账算给他们听,也就是我们在学习总路线时自己算过的四笔账。

1. 从資本家办企业的願望来講：

我們資本家办企业,总希望办得越大越好,可是在旧社会里,帝国主义侵略我們,官僚資本主义大魚吃小魚,这是人吃人的世界,許多人跌倒爬起,爬起又跌倒,真是风雨飄搖,朝不保夕。我自己就是过来人,解放前 30 多个职工的厂也保不了,那里談得上发展!解放后只短短几年,却发展得这样快:职工人数增加了,厂房是新建的,在郊外綠化的环境里,夏天凉快,冬天暖和,車間里有各种各样的劳动保护設備,厂里有飯厅、礼堂、疗养室、托儿所、浴室、运动場、图书室、职工夜校、集体宿舍等等,职工上下班有交通車接送,我們的工厂过去在小弄堂里,缺乏光綫、空气,好象鸽子棚一样,和現在比較一下,真是天淵之別。我們厂里的机器設備都在逐步改进,有的由手工操作改进为自动化,例如自动磨鉋車、自动試写机等都是厂里自己創造改进的。現在我們厂已經是一个全能工厂,每一件另件都能自己做。职工們还仿制苏联摺叠皮管,解决了自来水笔漏水的毛病。現在,我們厂里新品种增加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成本也降低了,1957 年,估計要比 1956 年降低成本 8 % 以上。这在合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現在,帝国主义的傾銷侵略,官僚資本的压榨排挤,关厂、停工、失业的痛苦是一去不复返了。

2. 从个人和家庭生活来講：

过去資本家办企业,为的是要自己生活好,家庭儿孙有保障。可是資本家在解放前生活不稳定,一会儿暴富了,揮霍浪費,一会儿企业倒閉了,就束紧褲帶;老話說:“富貴不出三代”,有了錢,强盜綁票、子女墮落;經營失敗时妻离子散、家破

人亡，这是很平常的事。現在資本家生活安定了，以我來講，現在工資和津貼每月收入 232 元，每年還有定息 2,000 元可得，生活過得很好，很愉快，用不了的錢，可以拿出一部分來購買公債等。

3. 從工作和前途來講：

我小的時候想做老板，就是為了要爭氣，要人家看得起，自己開店開廠封自己為經理，可是這個經理也當不牢靠，在舊社會里，一個婦女根本是沒有人看得起的，只有在解放後，婦女才真正得到了和男子一樣的平等的權利。幾年來，黨和政府對我很關心，經常培養和教育我。我現在擔任華孚金筆廠的經理，這個職務是政府任命的。在政治生活方面，我還當選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還擔任了中國民主建國會上海市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這是黨和人民對我的信任。毫無疑問，只要自己努力學習，積極接受改造，踏踏實實的工作，一定可以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與全體人民一道進入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

4. 從國家來講：

每一個中國人都希望我們中國能夠成為一個獨立富強的國家，我也是中國人，當然也不例外。解放前，我們國家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不能獨立自主。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國家決不能有今天的獨立；不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國家決不可能富強。這些道理，從我們自己的親身體驗中已經証實了，是再也不用懷疑的了。現在我所要考慮的只是這麼兩個問題：

第一，解放前我對革命沒有什麼貢獻；解放後所做的也是很微小的一些工作，卻得到黨和人民這樣的信任和尊重，得

到了这么高的荣誉和地位，以及愉快的生活条件，真所谓是“有名、有利，有职有权”。在我们的国家里，不容许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因此我要把自己有益于人民的一切智慧和精力，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二，我所担负的工作，和我的能力不相称。因此我要加紧改造，努力学习，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通过学习和实践，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和教育。